

郭沫若同志在甲骨学上的巨大贡献

胡 厚 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逝世了！这对我们国家，特别是对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郭沫若同志是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他是一面旗帜，一颗巨星。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建树了辉煌的业绩。他对于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像甲骨、金文、石刻、文书以及戏剧、诗词、书法等等，几乎无一不精，在各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只谈一谈他在甲骨学方面的巨大贡献。

(一)

甲骨文，自从1899年开始发现，刘鹗出了第一部材料书，孙诒让写了第一部研究性的著作，罗、王以后，作者渐多。但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征引甲骨资料，“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首推郭老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书虽然成于“草创时期”，但在“中国古代社会机构和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上”，确实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尤其是“在思想分析的部分”，更有“它的独到”的地方。结合甲骨文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郭老是第一人。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有《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篇，分为两章。第一章根据甲骨文字，结合出土器物，研究商代的经济基础，象渔猎、牧畜、农业、工艺、贸易等等。第二章根据甲骨文字，结合文献资料，研究商代的上层建筑。这章又分为两节，一节讲氏族社会的残余，象彭那鲁亚制，母权中心，氏族组织，氏族活动等等。一节讲氏族社会的崩溃，象私有财产的发生，阶级制度的萌芽，奴隶的来源和使用等等。原来还想写第三章，专讲当时的精神文化，其详另见《甲骨文字研究》一书。

这书研究的方法，乃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响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因而“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这本书“是一部划时期的作品。”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正当我国学术界进行着所谓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时期,一些托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否认中国社会史上有奴隶社会这一阶段的存在。郭老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用丰富的历史事实,阐明了西周是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这对当时那种借口说我们的国情与一般不同的“中国社会特殊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是一个强有力的批判和打击。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自从 1930 年在联合书店出版后,在抗日战争以前,就有几家书店,曾经加以翻印。抗战胜利后,1947 年群众出版社再版,由著者加以删订,后附《后记》一篇。解放后,1954 年人民出版社改排新版,著者又加删改,并加补注,前附《新版引言》。196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收入《沫若文集》第十四卷。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先后也都印了好多版次。总之,此书重版印数之多,在一般学术著作中是罕见的。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历史学和甲骨学界,确实产生了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二)

郭老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为了搜集第一手资料起见,对于殷代的甲骨文字,也就不得不进行研究。”他说,“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拘于文字史地之学;然识字乃一切探讨之第一步,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所以在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同时,又撰著《甲骨文字研究》一书。

《甲骨文字研究》,1931 年大东书局出版,共收考释论文十七篇。解放后,1952 年重加整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删去九篇,加进一篇,实收论文九篇,前附《重印弁言》。1962 年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刊,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有些地方,著者加了眉批。196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沫若文集》第十四卷,又从九篇论文中选录了四篇。

书里所收,虽然都是一些考释性的论文,但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考证文字,“是想通过一些已识未识的甲骨文字的阐述,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甲骨文字研究》是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如《释藉》、《释勿勿》言农耕生产,《释朋》言贸易货币,这是研究商代社会的经济基础。《释祖妣》言婚姻发展及母权时代的子遗,《释臣宰》言奴隶制度及阶级统治的变迁,这是研究商代社会的上层建筑。《释和言》言音乐技术及其祭祀,《释五十》、《释岁》、《释支干》言天文历数,这是研究商代社会的精神生活。

《沫若文集》第十四卷,于《甲骨文字研究》只选录四篇,因为在九篇论文之中,《释祖妣》、《释臣宰》、《释岁》、《释支干》这四篇,乃是更为重要的文章。

《释祖妣》一文,除了研究古代婚姻制度的发展和母权时代的残迹之外,还讨论了天神上帝观念的起源问题。卜辞中已有帝字,有的在帝前加一上字而称上帝。天上的神称帝,人间的统治者也称帝,帝字乃是一个人神兼用的名词。

这一论点，后来又扩充论述，写成了《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书，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又收进《青铜时代》一书，1945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解放后，1954年人民出版社重印，1957年科学出版社重版，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收入《沫若文集》第十六卷。

文中进一步申述古代天道观念的发展。从卜辞看来，殷代的确已经有了至上神称帝和上帝。“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上帝能够命令，上帝有好恶，一切天时上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争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都是由天所主宰。”有了上帝就会有下帝，下帝就是人间的王。“帝的称号在殷代末年已经由天帝兼摄到人王上来了。”但在卜辞中，还不曾称之为天，帝称为天，“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

由于这一论点的启发，后来许多甲骨学者，对于殷代的天神崇拜和上帝王帝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写出了不少著作。

《释支干》，除了研讨十干十二支的起源和意义之外，还讲了中西文化的交往和殷代天文历法的水平问题。至于关于十日的传说，迄今还有天文学者在那里作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释岁》一文，研究了岁星的起源问题。卜辞中确有岁字，用为祭名，因为一岁才举行一次的祭祀故称为岁。郭老认为必先有岁星而后始孳乳为年岁之岁，因而推知殷人必已知道岁星。

后来在卜辞中除了大量的今岁、来岁、今来岁、二岁、三岁、十岁等称年为岁的词句之外，还发现有大星大岁的星名。这样就更引起甲骨学和天文学者的重视和研究。最近还发现甲骨文里确有清楚而完整的大岁的名称，殷人已知岁星，大约不成问题。郭老的意见，是正确的。

至于《释臣宰》一文，一方面研究了奴隶的名称和来源，另一方面又论述了奴隶的逋逃和待遇，还讨论了一部分奴隶的身分和升迁的问题。这些问题，郭老在其他的著作中，也不断的加以探讨。正因为这些都是奴隶社会的中心问题，所以多少年来在甲骨学和历史学界，就殷代众、羌、臣、仆、奴、婢、奚、妾、执、艮等的身分问题，殷代人祭人殉问题，殷代的俘虏问题，殷代的奴隶问题，殷代奴隶的逃亡和反压迫斗争问题，以及殷代奴隶社会的特点问题等等，都引起了热烈的研究和讨论。

(三)

郭老为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乃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为了研究甲骨，就注意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当他住在日本的时候，发现“殷虚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就“以寄寓此邦之便，颇欲征集诸家所藏以为一书。”探访所得，“合计已在三千片左右。”但因“尚有大宗搜藏家，因种种关系未得寓目”，又因为在日本没有拓工，他自己也“不长于此”，所以就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另编《卜辞通纂》一书。但在《卜辞通纂》的《别录》中，仍然收录了他所探访搜集的一些未经著录过的甲骨资料。

《卜辞通纂》，1933年日本文求堂书店出版，1977年日本朋友书店重印。目前科学出版社

正在加工整理准备再版中。

郭老自序说,“本书之目的,在选辑传世卜辞之菁粹者,依余所怀抱之系统而排比之,并一一加以考释,以便观览。所据资料多采自刘、罗、王、林诸氏之书,然亦有未经著录者,如马叔平氏之凡将斋藏甲骨文字拓本,何叙甫氏所藏品之拓墨,及余于此间所得公私家藏品之拓墨或照片,均选尤择异而著录之。”

全书除《别录》一二九片之外,正编共收甲骨八百片,分为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等八项,考释在每项之后,还作一小结。这样,综览全书,一方面对于卜辞内容,可有一全面系统的了解;另一方面从各项卜辞,也可以得知殷代社会各个方面的一般情况。

这部书的主要贡献,郭老在《序》文及《后记》里,已经有所论及。象甲骨断代,碎片拼合,田猎区域,虹蜺传说,以及称风神为帝史,以干支计日程,殷车常驾二马,卜雨兼卜其来自四方,卜辞有多到 63 字的长文,记验有的已在 179 日以后等等,都是过去“罗、王诸家所未识”,即是作者自己,也是“于纂述此书以前所未预料”的事情。

而其最为突出的创见,是以𠄎甲为沃甲,以𠄎甲为阳甲,从此解决了殷先王中各家争论不休的问题。

卜辞有𠄎甲,罗振玉释𠄎为羊,谓“羊甲即史记之阳甲”,王国维从之。也有的甲骨学者于𠄎字从孙诒让释羴,但亦以羴甲即阳甲。羊羴阳声音固然可通,可是这和殷王世次,实不相合。郭老释𠄎为𠄎,在《卜辞通纂》《序》《后记》《书后》及 118 片考释中,根据东京大学一甲及孙壮所藏拓本以及《簠帝》39、117、146、151 等片里殷王世次考察起来,以𠄎甲即沃甲。以后在《古代铭刻汇考》一书《殷契余论》中《申论𠄎甲》一文及《殷契粹编》一书第 250 片的考释里,更加补充,此说遂成定论。以羴甲为阳甲的甲骨学者,后来也都改从郭说。

与𠄎甲有连带关系的,还有一个𠄎甲。此字罗王未释。有的甲骨学者释虎,以虎甲即沃甲。但与殷王世次,亦不相合。郭老于《卜辞通纂》释此字为𠄎,根据殷王世次,𠄎甲既为沃甲,𠄎甲即为阳甲,其后续加申述,此说遂亦成为定论。

加拿大人明义士在《表较新旧版殷虚书契前编并记所得之新材料》一文,根据《国学丛刊》本的前 1·22·3,其殷代先王次序,𠄎甲在南庚与盘庚之间,亦认为应当即是阳甲。这与郭老的说法,不谋而合,并为郭说提供一新的论证。

至于郭老搜集发表日本所藏甲骨文字的意图,后来也有不少甲骨学者,续作这方面的工作。先后出版的,就有《殷契遗珠》、《龟卜》、《河南安阳遗宝》、《书道博物馆藏甲骨文字》、《日本散见甲骨文字蒐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及两种《日本所见甲骨录》,等等。又如《天理参考馆所藏甲骨文字》也在整理编辑中。

(四)

郭老在日本,正当注意搜集甲骨资料的时候,正好金祖同由国内带着上海大收藏家刘体智

所藏甲骨二万八千多片的全部拓本，前来日本，请郭老选印。郭老乃从中选出菁华一千五百九十五片，编辑考释为《殷契粹编》一书，仍由日本文求堂书店出版。解放后，1956年也仿《甲骨文字研究》之例，列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刊，经过换片加工，由科学出版社重印出版。

“本书分类，大抵与《卜辞通纂》相同。”惟卜辞内容，颇多精品，考释方面，也有更多重要的阐发。

如高祖夔之称，首见著录于本书的1、2两片。由112、113两片拼合版，知殷代先公上甲之后，其世次当为乙丙丁，可以订正《史记·殷本纪》的谬误，为王国维的学说，添了新的证据。

其他又如郭老自序所说，“日之出入有祭，足证《尧典》‘寅宾出日’及‘寅饗入日’之为殷礼。风为伊嘏，步有方位，足征殷人神话之残痕。曦假兮字为之，昏实不从民作。雩或作雩，舞旱之意甚明。厥本作穹，畜马之闲如覩。方伯舞胥之官，南单三门之地，又史又宗，五山五臣，或制启后来，或名属仅见。又如以巳字为语助，假火字以代凡，八千八百三十册诸合文，大今二月大今三月之异语”，等等，也都是“本编所创获，足以矜耀于士林”的。

此外还有关于卜法文例，兆序兆辞，记事刻辞，称谓纪数，成语句法，兹用兹御，求年告秋，求生冥妣，以及王作三师之制，三二示之称，四方受年之贞，殷人纪时之习，田猎日期之事，如此之类，更是美不胜收。

譬如兹用兹御，在郭老只不过提了一两句，如说，“兹用，盖言于多次卜贞之中，决用此卜。”又说，“兹御，卜辞恒语，盖犹他辞言兹用也。”由于这一提示，经过综合分析，就可以写成专篇论文，知道乃是殷人在占卜以后，除了卜辞之外，还记上是否按照所占卜的事情去施行的一种记用之辞。

又如求生冥妣，郭老在《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中，都有所论及。在《古代铭刻汇考续编》、《骨白刻辞之一考察》一文，除了对骨白刻辞提出新的看法之外，对冥妣问题，也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

率生，罗振玉误释求之，郭老释作率生，谓“率生者当是求生育之事”，“犹《诗·大雅·生民》克禋克祀，以弗无子也。”冥妣旧误释彘奴，不少人并以奴为奴隶，且以为奴隶社会之证。郭老释冥，读为娩，又以妣为契省，读为嘉。冥妣言妇女分娩，“卜其吉凶”。

帚，罗振玉误释为归，有人还据此引申为“之子于归”之归，并错误地写成《殷卜辞婚嫁考》一类的文章。郭老释帚为妇，以妇某为人名。其人即武丁之妃。卜辞常说妇某冥妣，即占卜武丁之妃名妇某者分娩是否吉利。

由这一论点，再进一步全面综合论述，便可以考见殷武丁是多妻的，并且可以考知殷代的生育制度，卜辞中占卜武丁的妃妇们有孕分娩，是以生男为嘉生女为不嘉，是很清楚的重男轻女的。

(五)

除了这几部专书之外,郭老还有关于甲骨文字的一些散篇论文,长短九篇,统名为《殷契余论》,收入《古代铭刻汇考》一书,1933 年日本文求堂书店出版。1934 年又出版《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也收有关于甲骨文字的散篇论文三篇。近年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郭老以八十岁的高龄,还写过一篇《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先登在《考古》1972 年 2 期,1973 年又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出土文物二三事》一书。又写过一篇《古代文字的辨证的发展》,先登在《考古》1972 年 3 期,转载在《考古学报》1972 年 1 期,1973 年又收入《奴隶制时代》的重编本。

这十四篇论文,除了《释镋咎》后来郭老已经加以修订;《申论芍甲》、《骨臼刻辞之一考察》及《释勿勿》三文前面已经有所提及之外;《释易日》以易日为暘日;《释曷亩》以曷亩为鄙廩;《殷契拾遗》补充了殷王的先妣;《缺刻横画二例》,除了补充缺刻横画的例证以外,并指出缺刻竖画之例,亦往往有之;《古代文字的辨证的发展》,谈到了有关甲骨文字的用途,事类,程式,规律,刻划,技巧,等等;《宰丰骨刻辞》及《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两文,除了考释文字,断定时代以外,还讨论了殷王锡饮及卜用三龟三骨的习俗,问题都很重要。

就连《断片缀合八例》及《残辞互足二例》这样信手写下的割记式的文字,也都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断片缀合之例,始于王国维,不过那时他才拼了一片。到郭老的《卜辞通纂》,就拼了三十多片之多。《殷契粹编》一书,也拼了不少。零碎所得,就写成了《断片缀合八例》一文。由于这样的一些启发,后来好多甲骨学者都有续作,象什么《甲骨缀存》、《甲骨缀合编》、《殷虚文字缀合》、《殷虚文字丙编》、《甲骨缀合新编》、《甲骨缀合新编补》等书,不一而足。此外中外好多甲骨学者,也都注意这一问题。郭老所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一书,也特别重视此事,在前人已经作过的基础上尽量继续加以拼合,所以所得就较前人为多。

《残辞互足二例》一文,也是一样。殷人占卜,常常使用多块甲骨,每块甲骨占卜之后,一般都要刻上卜辞,这样就出现了卜辞同文的例子。同文的卜辞,如果遇到残缺,就可以互相补充。我们这次在《甲骨文合集》的编辑过程中,也特别注意这样的例子,凡是同文的卜辞,都按照卜序,编排在一起,这样残辞互足的例子,就更加多多了。

应用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把许多残缺的卜辞,都补直成为全文,这在甲骨学的研究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发凡启例,都可以追溯到郭老的两篇文章。

(六)

谈到郭沫若同志所主编的《甲骨文合集》,这乃是敬爱的周总理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领导制订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中的大型项目之一。还在 1959 年,我们历史研究所就接受了这一任务。在党的领导下,研究所先邀请全国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及若干甲骨文专家,组成

了以郭老为主任委员的编辑委员会，并请郭老担任主编。在所内成立了甲骨文合集编辑工作组，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

多年以来，在《甲骨文合集》整个编辑过程中，一直受到郭老无微不至的关怀。每当我们把编辑计划草案送给他，他总是详加批示，很快还给我们，以便于工作的迅速进行。

他让我们尽可能把材料搜集齐全，让我们在书后加上一些附件，他还让我们仔细考虑，卜辞中究竟有没有所谓公社，还有就是到底有没有帝辛时的卜辞。

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合集》工作，前前后后，停了一个很长的时期。一旦恢复，郭老很高兴，写信告诉我们，工作既在进行，就积极推进，首先把稿子编好。他还把我们写给他的信，加上批语，送交国务院原科教组，使《合集》工作得到领导上的支持，列为重点任务之一，出版问题，也得到了落实。

大前年《合集》将要试印，那时候郭老刚刚病愈，还没有多久，就忙着为《合集》题字，非常认真。只可惜今年《合集》开始付印，已经看到样书，第二册不久就要正式出版，郭老的《前言》还没有来得及写，他就不幸与世长辞了！郭沫若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对于《甲骨文合集》来说，更是一件莫大的憾事！

《甲骨文合集》是一部集大成的资料书，将来全部出版，如果对甲骨学的研究，能够有所贡献的话，除了党的领导，各方面的支持以及工作同志们的辛勤劳动之外，这就与我们的主编敬爱的郭沫若同志的热情关注，是分不开的。

（七）

郭沫若同志还有更为令我们崇敬的是他那一种虚怀若谷的谦逊精神。他凡是一种著作出版之后，总是不断删改修订，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作斗争。”

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1944年就写一篇《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先登在《群众》9卷20期，1945年收入《十批判书》，列为第一篇，群众出版社出版。1950年改排重版，后附《改版书后》。1954年人民出版社重印，1956年科学出版社重印，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五卷。

文中说，“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一九三〇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虽然成于“草创时期”，但那确实是第一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结合丰富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著作，所以在学术界才发生那么大的影响。而在郭老自己，却是那样的谦虚！

以后这本书每次重版，郭老都亲自加以删改修订，或加补注，有的还附上《后记》或《前言》。有些修订的意见，还散见于其他的许多著作中。正是由于郭老这样的负责认真，研究不断更加

深沉,见解不断更加纯练,因而在 1952 年便写成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又一著名的重要著作《奴隶制时代》。

《奴隶制时代》一书,1952 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4 年人民出版社改排重版,1956 年科学出版社重印,196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七卷,1973 年人民出版社重新改编再版。

在《奴隶制时代》这一本书里,除了更加正确地处理了有关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些问题之外,还特别研究了我国古代史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划分时期的问题。

即是关于中国古代史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郭老也是反复研究,几次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我在前曾认西周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是不正确的。其后我又把陈涉吴广的大革命作为分水岭,把秦代也划入了奴隶社会,这后一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因而在《奴隶制时代》,就“把古代社会变革的界限定在了春秋与战国之交。”

又说,“关于奴隶制的下限,我前后却有过三种不同的说法。最早我认为:两种社会制度的交替是在西周与东周之交,即公元前七七〇年左右。继后我把这种看法改变了,我改定在秦汉之际,即公元前二〇六年左右。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初,我写了《奴隶制时代》那篇文章,才断然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即公元前四七五年。”

关于其他的一些历史问题,也是一样。如关于殷代的农业,1930 年郭老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殷代“农业已经出现,但尚未十分发达”。到 1933 年在《卜辞通纂》说,“大抵殷人产业以农艺畜牧为主。”1944 年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则说就卜辞所见,殷代“农业已经成了主要的生产了”。1952 年在《奴隶制时代》也说,根据卜辞的记载,殷代“农业的生产却已经确实地成为主流了。”

又如关于殷代的牛耕问题,1934 年郭老在《释勿勿》一文,只说,“𠂔𠂔实𠂔(犂)之初文,𠂔耕也,此字从刀,其点乃象起土之形。”1944 年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还说,“殷人是不是已经用牛耕,没有直接的证据。”到 1952 年作《奴隶制时代》,则说“殷人已经发明了牛耕。卜辞有很多犂字,作𠂔或𠂔。勿即象犂头,一些小点象犂头启土,𠂔在牛上自然就是后来的犂字,这可证明殷代是在用牛从事耕种了。”

正是由于郭老这种勤于探索勇于创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负责认真的精神,对每一问题,都不断研究,不断深入,对自己的见解,也就不不断纠正,不断修改,所以到最后终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八)

郭沫若同志还以自己切身的经历,告诉我们以科学研究的方法。他说,“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他又说,“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重要,这是先

决问题。”研究甲骨文和从甲骨卜辞研究古代的历史，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郭老告诉我们，这是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必须掌握丰富的可靠的资料。郭老说，“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设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但是我国传统的文献资料，象经子古史等类典籍，还有一个真伪和年代的问题。郭老说，“研究中国古代，大家所最感棘手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所以使用古代的文献资料，必先对这些材料加以考订和鉴别，他说，“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他又说，“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关于甲骨文，倒是“研究殷代的第一手资料”，就是依靠这一批资料，“中国古代的真面目才强半表露了出来。”但是根据卜辞研究作为社会史料，郭老提出了一个“迎头赶上”的问题。他说，“卜辞研究是新兴的一种学问，它是时常在变迁着的。以前不认识的事物后来认识了，以前认错了的后来改正了。我们要根据它作为社会史料，就应该采取迎头赶上的办法，把它最前进的一线作为基础而再出发。”这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当时“有好些新史学家爱引用卜辞，而却没有追踪它的整个研究过程，故往往把错误了的仍然沿用，或甚至援引错误的旧说以攻击改正的新说，那是绝对得不到正确的结论的。”

郭老还特别重视考古发掘，他认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他早年曾经翻译过关于考古的专书，抗战期间在四川，他也曾参加过实际的考古发掘工作。他从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即密切注意“殷墟之发掘”，直到1952、1954和1972年，他出版和改编《奴隶制时代》一书，也都大量引用解放前后殷墟考古发掘所得的资料。

除了这些直接史料之外，郭老还提出要重视间接的资料来作比较研究。这些间接的资料一方面是世界历史的资料，另一方面是国内兄弟民族的资料。他说，“要阐明我国的古代社会自当尽力找寻和占有直接的史料。但因时代远隔，直接的史料很有限，因而必须采取权宜的办法——用间接的资料来作比较研究。古代的希腊罗马自然可资比较，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国内的兄弟民族的情况能够为我们提供出很丰富的资料。”我们看他在《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和《奴隶制时代》等书里，就都曾引用过彝族社会的奴隶制来和古代殷周社会的奴隶制作比较研究。

这些科学的严密的研究方法，都是他多少年来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宝贵经验。

郭沫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他的对学术研究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顽强毅力，他的坚定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他的勤奋的精

神和谦逊的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我们所衷心爱戴和尊敬的郭老和我们永别了! 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 踏上新的征途, 向科学现代化进军, 为早日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 奋勇前进!

COMRADE KUO MO-JO'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ORACLE INSCRIPTIONS

by

Hu Hou-hsüan

The death of Comrade Kuo Mo-jo, an outstanding Chinese proletarian cultural fighter, is a great loss to our country, particularly to the country's science and culture. Comrade Ku Mo-jo was a famous scholar of broad learning and a man of marked talent who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various fields of sciences, including the study of oracle inscriptions. Among his works in the latter field are such well-known titles as the *Chia Ku Wên Tzû Yen Chiu* 甲骨文字研究, *P'o Tz'u T'ung Ch'uan* 卜辞通纂 and the *Yin Ch'i Ts'ui Pien* 殷契粹编. Mention should also be made of his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like the *Chung Kuo Ku Tai Shê Hui Yen Chiu*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 the *Nu Li Chih Shih Tai* 奴隶制时代. In addition, such of his other works as the *Ku Tai Ming K'ê Hui K'ao* 古代铭刻汇考, *Ku Tai Ming K'ê Hui K'ao Hsü Pien* 古代铭刻汇考续编, *Ch'ing T'ung Ch'i Shih Tai* 青铜器时代, *Shih P'i P'an Shu*, 十批判书 and *Ch'u T'u Wên Wu Erh San Shih* 出土文物二三事 also discuss, among others, oracle inscriptions.

Comrade Kuo Mo-jo's contributions to the clarification of such problems as the period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the genealogy of the Shang kings, the astronomy and calendrical system of the Shang dynasty and the status of the Shang slaves opened up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early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to the study of the Shang history. It was largely 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his pioneering work in the study of oracle inscriptions that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Chinese scholars have published numerous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on the subject. Indeed to this day his influence can still be discerned in this field in such technical matters as the piecing together of fragmentary texts of oracle inscriptions.

It is much deplored that Comrade Kuo Mo-jo who was the editor of the *Chia Ku Wên Hê Chi* 甲骨文合集 should have died on the eve of its publication. But his meticulous scientific approach, his diligence in exploring new problems and his courage in blazing new trails, as well as his honesty and his adherence to truth, have set an everlasting example for all of us to follow.